

• 地久天长集 •



di jiutianchangji

di jiutianchangji

• 叶君健 •

地久天长集

地 久 天 长 集

叶 君 健 著

重 庆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甘)新登字第 03 号

地久天长集

叶君健 著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42,00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422-0652-4/I·152 定价: 8.25 元

前 记

光阴过得真快。自从1949年年尾我从英国回到新中国以来，不知不觉之间四十多年过去了。由于岗位工作繁忙，光阴流逝的这种速度我竟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只有近些年来，有的朋友相继离开了人世，我才发现时间在偷偷地从我们的生命中溜走，而且很无情。对此，我的感情有时也不免起点波动。在这波动中我有时也不禁要写点关于朋友的回忆文章，不仅是关于已故的，而且也包括尚健在的，藉此刻下一点这短暂人生的痕迹。这些朋友，由于各自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人生观和欣赏趣味自然也有差异，但作为有感情的人，这些都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真诚的友谊。

在这种同样的考虑下，我也写了一些有关国外朋友的回忆性文章。这些朋友，有的四十多年来由于一些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为所谓“海外关系”所阻我未能与之互通消息，只是近些年来我出国去参加一些国际文化界的会议或讲学，才得有机会与他们重逢；有的则是新交——鉴于许多旧交并没有因为长期的音讯阻隔而失去友谊，我觉得新交也值得珍视；还有一些我没见过、但我读过并热爱他们的作品的作家，我也认为他们是我精神上的朋友；还有一些我只见过一面，但我从中所感到的友情，也不亚于旧友。由此我更进一步甚至觉得新访问过的一些地方和场所也值得纪

念，值得留下记忆。这个集子里所收集的文章，便是这种有关人、物和事的散文式的怀念作品，其中夹杂着一点个人的感想，但由于这些文章本来属于个人性质的，我想这也是可以容许的。

“附录”中的一篇是一个著名英国作家所写的有关我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代表我的一些外国朋友对于我的记忆与怀念，因而也把它转载在这里。

书名则是源于苏格兰诗人波恩斯（Robert Burns 1759—1796）于1789年写的一首诗的名字 Auld Lang Syne 的诗。这首诗在英国一直广为人传诵，后来被谱成歌，人们集会离开时或朋友分手时，就一起唱这支歌，作为惜别。1949年秋我离开英国回国时，我在剑桥的朋友们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散会时大家拉着手，一边舞一边也唱这支歌，意思是我们今后相隔虽然遥远，但友谊却长存不变。英国有一部著名影片《魂断蓝桥》，它的主题歌的调子也是来自这首诗。我们把它译成“友谊地久天长”。我现在引用它作为这个集子名，也代表我编这个集子时的感情。

叶君健

1991年6月

目 录

前 记	(1)
我的主编茅盾	(1)
他祈求安定与太平	(6)
和翰老相处的日子	(17)
“哑行者”	(21)
两张合影	(34)
一位坐堂郎中	(38)
平凡而伟大的医务工作者	(42)
陈西滢和凌叔华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页	(44)
见故人	(55)
我和爱泼斯坦	(60)
她是在东京遇见的	(73)
和斯沫特莱的一段交往	(82)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巴	(92)
保卫文化与和平	
——在波兰遇见的作家们	(95)

阿瑟·米勒的来信·····	(112)
附：今年的贺年片·····	(114)
新结识的一个美国女大学生·····	(119)
空中女服务员·····	(130)
和埃格纳的会见·····	(138)
两个热情的接待员·····	(151)
记路易·艾黎·····	(166)
会见帕特里克·怀特·····	(192)
附：新年祝词·····	(198)
艺术的重任	
——读帕特里克·怀特的来信·····	(199)
一对出租汽车司机·····	(202)
为一个朴素事业而献身的人	
——三宅史平·····	(211)
飞来的噩耗·····	(215)
欧文·拉铁摩尔·····	(220)
“象牙之塔”里的沉思·····	(230)
一个被遗忘了的诗人：爱罗先珂·····	(238)
“丹麦诗人安徒生在这里出生”	
——访问奥登塞·····	(247)
一个童话作家的“爱情”故事·····	(266)
国际笔会的朋友们·····	(272)
日本的旧交·····	(281)
自由、个人、生活、创作	
——由此而联想起两位西方女作家·····	(288)
“诗人的职责”·····	(297)

“老游击队员”及其他.....	(313)
一代“文苑精华”.....	(330)
在一个乌兹别克诗人的家里.....	(356)
一个来不及见到的作家.....	(360)
普利斯特莱一家.....	(364)
安娜·西格斯.....	(395)
新结识的一位保加利亚女诗人.....	(397)
伽伦——美国笔会的灵魂.....	(405)
又接上了和柴门霍夫一家的友谊.....	(417)
尤利·巴基.....	(427)
远方来信.....	(432)
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亲属.....	(437)
澳大利亚的新交.....	(442)
斯拉娃·珈特纳尔.....	(449)
啊,“这个英国”.....	(458)
附录:	
“布隆斯伯里”学派中的一个中国人.....	(464)

我的主编茅盾

两个月以前，为了一项国际世界语活动的事，我曾在电话上请茅盾同志帮助，他慨然同意了。比那时更早几个星期他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我，也是有关三十年代一位外国作家在中国从事革命文化活动的事。虽然他的年事已高，但他办事和处理问题仍然是非常认真、仔细和迅速。我常常为他的精力充沛和头脑敏捷而钦慕。“四人帮”倒后，我知道他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忙，找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所以这几年来我只去看过他一次，问候他的健康状况。我们谈了一些有关他的视力和眼疾问题。以后我就不敢再去干扰他了。我想他的工作压力总有一天会减轻一些，那时我再找机会去看他。他是一位文学修养深厚、生活知识丰富的老前辈，我每次和他交谈总是得到教益不少。但是这个机会现在没有了！我感到无限的怅惘。

我从中学时期起，就是他的一位热心的读者。但我认识他还是在抗战时期。与他来往比较频繁则是在武汉沦陷，我撤退到香港以后。我也在那里做点文化工作，同时也为外国的文学刊物译些国内抗战的作品。那时的香港不像现在，在文化上可说是相当荒凉。追逐金钱是人们活动的中心，社会上最尊贵的人物和令人景仰的头衔是“经理”。中文当然是那里的通用语言，但却和我们

在内地所用的不同。举例来说，在街道上的公共汽车站，你会发现牌子上写的是：“若要停车，乃可在此。”香港有个有名的天主教堂圣母院（Notre Dame），它在当地的中文译名却是“余之夫人堂”。由于战争的关系，内地也有些文化人陆续来到香港，生活书店也设了分店，文化工作可说是逐渐展开了。但那时这项工作的对象基本上就是具有上述文化特点的当地读者。

局面的打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文学这个领域。首先得改变文风，改变风气，改变方向。茅盾同志到香港，是带着一个文学刊物同去的，即《文艺阵地》。这个刊物的出现才算逐渐在这个城市吹来了一点新鲜的风：它带去了内地的抗战文学作品，包括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带去了内地许多作家的名字和中国新文学的战斗传统。港澳的读者开始了解到什么叫做新文学和文学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文学的空气也开始在香港活跃起来。文学青年也逐渐出现。茅盾同志经常接待他们，指导他们的文学欣赏和创作，于是香港便也有了新文学和作家。这种新局面的出现，影响所及，也扩大到了南洋——新加坡和马来亚——一带。那里中国血统的知识青年也受到了感染，而开始了新文学活动。我不敢说茅盾同志在这个地区发动了什么新文学运动。但香港——包括南洋——文学空气能够有今天这样一个比较活跃的面貌，不能说与茅盾同志当初在那里所做的基础工作没有深切的关系。

茅盾同志曾经离开过香港一段时间，后来又回来了。我也曾经离开过香港一段时间，去当时被称为孤岛的上海，但不到一年也回来了。我照旧不时去请教他，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我才离开香港，来到重庆。茅盾同志据说是在香港失守后才脱险离开的。他也来到了重庆，就住下来了——和王炳南同志住同一幢房子。我也不时去看他，但有一次被国民党的一个特务发现了。他跟踪了我

一段路，最后我总算还是摆脱了他，可是从此我就没有再去看茅盾同志了。后来我去英国，就完全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住在英国剑桥，也开始写些有关中国农村的故事。茅盾同志的作品是我当时从事“创作”的一种灵感的源泉。他在他的作品中所坚持的严峻的现实主义，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一直是我学习的标准。他的中、长篇小说现在已被公认为不朽的作品，但我觉得他的短篇也是世界杰出的名篇。特别是那个“微型”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给我的感受最深。他以极经济的篇幅和极高超的技巧，描绘出作为中国大革命的背景的、由广大农民所构成的中国社会的一个真实的缩影。我曾把它们译成了英文，和其它一些战时短篇小说，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姚雪垠的《差半草麦秸》等，放在一起，组成一部中国现代短篇集。这个集子就是以这个“微型”三部曲命名的：《三季》(Three Seasons)，在伦敦出版。外国许多评论家们读了这个“微型”三部曲后也与我有同感，认为它们是世界杰出的短篇小说，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小型三部曲，人们可以懂得蒋介石政权为什么一定要崩溃，中国的革命为什么在农村发展得那么快，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广大的农民支持。这个小型三部曲当时在国外无形中起了形象化地解释以农村为根据地的中国革命的作用。

解放以后，我编以外国读者为对象的一个英文刊物《中国文学》。从1953年起，茅盾同志就是这个刊物的主编，我是他的助手，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他的名字被“革命群众”从刊物上拉下来为止。那时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多了，不仅业务上有些问题得常常向他请示，还有些外事活动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如1956年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和1957年在苏联乌兹别

克首府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他那时就是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是一个精通中外古今文学和政治修养很深的人，执行政策总是恰到好处，再加之他为人谦虚和蔼，因而也能广泛地团结来自各国的作家，所以每次会议总是取得预期的效果。作为一个直接在他带领下工作的人，我也从中学习了不少的东西。

多年来作为在他指导下的一个编辑，我当然在文学和编辑业务上学得了更多的东西。但是他给我同样不可忽视的启发、并经常使我感动的一件事，却是他和我的一些业务通信。我不时有些问题得向他请示，他总是很迅速地回答，一般是用书信的方式。我在这里不想谈那些信的内容，因为那牵涉的面广，我想谈的是一个细节。他每次写信从来没有用过公家的信封信纸，也很少用洁白的新信纸。他经常用的是一些应该扔进字纸篓的、看过了的油印品。他就是利用这种废纸反面较干净的篇幅写信，有时信封也是用较厚的废纸糊成的。我每次看到这些废纸上他亲笔写的字迹时，总不免要作许多联想。

这种做法说明了茅盾同志长年所坚持的一种节约的习惯，但这里面同时却也蕴含着许多比这意义还要更大的东西。从茅盾同志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出生一个堪称富裕的家庭，也没有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但他却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和蜚声世界的伟大作家。这完全是靠他个人的勤奋和努力。他一生经历过许多生活上的坎坷、政治上的起伏和思想上的动荡，但他对人生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的态度，对自己要求很高，他的俭朴作风也始终不变，即使后来他当了部长也仍是如此。这种作风表现出中国劳动人民的本色，也显示出常年在动乱中坚持奋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勤劳中国人民的本质和真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他的根是深深地扎在中国

人民的中间，与中国人民有血肉的关系。

这一点，茅盾同志在快要结束他一生时最后所留下的遗言——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出来：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重点是我加的。）

最后这句话说明了茅盾同志的为人态度，也说明了他的情操和理想，也说明了他的伟大，也概括地反映出在长期苦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我读到这里，不知怎的，总禁不住热泪盈眶。

他祈求安定与太平

1980年9月5日，我在挪威奥斯陆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北欧文学研究所做关于北欧文学十九世纪几个作家的报告。这是我在这所大学所做的最后一次讲学。报告完后，来到走廊上，该校东亚研究所的一位女研究员里德夫人忽然赶上前来，拿出一本中国汉文书，说有些文字上的问题弄不清楚，希望我能腾出一点时间给她解释一下。因为不久我就要离校去瑞典，再没有时间，我便当场解答她所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都牵涉到北京的口语和歇后语。原来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我给她解释完后便把这本书仔细翻了一下。她对书里面许多比较难懂的字句都用铅笔画了横道，书页边缘的空白处也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做了一些笔记。这本书原来就是老舍写的《骆驼祥子》。看来这位女研究员读得很认真，她可能在准备写一篇有关老舍的论文，作为她研究的成果或取得学位的依据。

这本来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但是当时却在我心里引起了很大的波动。我在奥斯陆大学讲学期间，因为住在该校一位教授家里，天天都与挪威的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接触，谈起中国近代文学的事情也不少，每次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问起老舍。的确，在近代的作家中，虽然斯诺和他的前妻尼姆·威尔斯译过一本名为

《活的中国》的短篇集，介绍了中国 30 年代二、三十位中国近代作家，但因为印数有限，影响不大。老舍的《骆驼祥子》是唯一被译成英文而成为畅销书的中国近代著作，因而，老舍便成了西方知识界所最熟知的名字。他们一见到我总要问起他的情况，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对我说来，要回答确也不是那么简单，而且每回答一次，事后总要引起许多感情上的波动。这次也不例外，事实上，这次的波动在出国前就已经开始了。

就在我出国的头两天，老舍夫人胡洁青送了我两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骆驼祥子》的戏票。这是这个戏在“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上演。北京那天正在下着小雨，天色很暗，街道上也是潮湿不堪。虽然我正在忙着收拾行李，准备远行，我仍同爱人一道到剧院去看了演出——一方面是怀念老舍，一方面也希望在那里遇见一些老舍的旧友——我想他们可能也会去看这次久违了的演出。但是我们却没有遇见什么熟人。这时我才忽然想到，这些朋友现在已经都是老人了。在一个雨天的晚上他们出来自然有困难。屈指一算，老舍本人离开我们已经十四、五年了。光阴过得真快！

“光阴过得真快！”这个感想又引起了我一系列其他的回忆，不知怎的——也许是因为我即将要远行的缘故，这些回忆在我的心头停留了好久不散，一直带到国外。现在，这位女研究员无意中又把我的这些回忆提醒了，而这恰巧又是我要束装回国的時候。

老舍要比我的年龄大得多。他在发表《骆驼祥子》的时候，我还不过是个大学生，是他的读者。我得有机会认识他是在 1937 年尾和 1938 年初这段时间。地点是在武汉。那时在广大人民要求积极抗战的压力下，蒋介石镇压人民的气焰暂时有所收敛。文艺界人士纷纷奋起，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人民一道

投入了抗敌的洪流。这是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凡是支持抗战的爱国文艺工作者都被吸收了进来。我那时也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那时我用的名字是“马耳”。国民党表面上虽然也不敢禁止这个组织的活动，甚至还派人参加，但实际上总是想破坏它，对它多方加以限制。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局面。要使它的工作正常进行，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周旋和斗争，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首先，得有一位为各方面所接受而又善于应付的人物出面领导这个组织。老舍是一个最适宜的人选。他也就毅然肩负重任，担当起这个组织的“总务主任”——即主席兼秘书长——的职务来。

1938年秋天武汉沦陷，撤到重庆。此后情况就变得更困难了，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有些进步文艺书刊开始被查禁，有些爱国作家和艺术家开始遭到逮捕和监禁。维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块招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老舍并不气馁，他把它维持下去了，而且它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也继续按期照常出版。

那时老舍的身体非常不好，贫血到了极点。他的家也不在身边，单身住在《新蜀报》的一间小房里。尽管报社的主人对他很热情，但这究竟是一种寄居“作客”的境遇，而老舍根据他当时的身体情况，正需要一个正常家庭环境的照拂和温暖。但是他坚持下去了，而且通过“协会”照常做他团结文艺界人士和应付国民党压力的工作。

我那时住在重庆郊外的沙坪坝教书，不常进城。偶而进城，只要可能，我总要争取去看望他一次。说来也很有意思，每见到我总觉得文艺的工作没有中断，而且在那阴暗的气氛中还在发出一点闪光呢——有时这点闪光甚至还扩大成为一颗亮光，给人们带来一些喜悦。每年在春节时《新蜀报》的主人总要请文艺界的

人士到报馆去吃一餐饭。参加的人不多，一般是一桌，桌上总是以老舍为中心。这时他总是谈锋很健，兴致特别高。他对当时现状所发的许多幽默而又锐敏的议论，除了使人感到痛快以外，也心情振奋，觉得尽管重庆的浓雾重重，文艺工作仍然在发出光辉。

1944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我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去英国做一项战时工作——到英国各地巡回演讲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以配合当时为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国内所展开的群众动员工作。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老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在美国的刊物上看到老舍到美国去了。他的小说《骆驼祥子》已被译成了英文在美国出版，并且很快就成了畅销书，在读者中掀起了强烈的反应。我是在学生时期，当它还是在杂志上连载的时候，读到它的。那时我对这部著作的印象很零碎。我多么想再读到它！但当时蒋介石正在国内掀起内战，英国邮局已把中国列为战区，通邮很困难，要想从国内把这本书寄来就更不容易了。所幸不久英文本也在英国出版了。伦敦的《文学与生活》(Life and Letters)月刊编辑部寄给了我一本，要我为该刊写一篇书评——那时我是这个刊物的固定书评撰稿人。我这才有机会仔细地从头到尾把它再读了一次。

也许这次是由于它是以外文的形式出版，我读它时感到特别新鲜。它的笔调轻松，描写也极为生动活泼，骆驼祥子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但读完以后我的心情却感到非常沉重。骆驼祥子所过的生活，在英国早已不存在，但在我国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在它里面我们可以呼吸到弥漫在果戈里和契诃夫的一些作品中的那种抑郁而又使人啼笑皆非的空气，但同时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托尔斯泰的《复活》一样，它里面却蕴藏着一种深深的人道主义精神。我在那篇书评中称老舍为近代中国